

中国文化的 综合创新之路

ZHONGGUO WENHUA DE ZONGHE CHUANGXIN ZHILU

方克立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文化的 综合创新之路

ZHONGGUO WENHUA DE ZONGHE CHUANGXIN ZHILU

方克立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文化的综合创新之路 / 方克立著. —北京: 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 9

ISBN 978-7-5161-1412-4

I. ①中… II. ①方… III. ①哲学—中国—文集
IV. ①B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16525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冯春风
责任校对 韩海超
责任印制 王炳图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010-64070619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2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36.75
插 页 2
字 数 460 千字
定 价 8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 010-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自序	(1)
21 世纪与东西方文化	(1)
儒家文化与未来世界	
——兼评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	(6)
在“儒学与世界文明”国际学术会议上的总结发言	(16)
21 世纪,能否淡化东化与西化之争?	(21)
经济全球化情势下的中华文化走向	(35)
第十二届国际中国哲学大会开幕辞	(56)
《第十二届国际中国哲学大会论文集》序	(62)
“和而不同”:作为一种文化观的意义和价值	(67)
费孝通与“和而不同”文化观	(86)
“天人合一”与中国古代的生态智慧	(96)
青海开发与生态文明建设	(122)
“文明以止”:中华文化的精华与精神	(130)
中国哲学史研究 50 年	(154)
20 世纪中国文化思潮	(159)
深化对“综合创新”文化观的研究	(170)
中国哲学的综合创新之路	(179)
张岱年在 20 世纪中国哲学史中应有之地位	(183)
张岱年与 20 世纪中国哲学	(205)

回应中国哲学“合法性”质疑的三个问难	(231)
关于文化的体用问题	(242)
综合创新之路的探索与前瞻	(260)
创建适应时代需要的新国学	(276)
学习张岱年先生的“兼和”思想与品格	(291)
钱学森之问与创新型人才培养	
——《亲证中国哲学大智慧》序	(302)
“马魂、中体、西用”：中国文化发展的现实道路	(310)
探索中、西、马三“学”的综合创新之道	(318)
开创二张研究新局面	(340)
中国共产党的文化自觉是中华民族之福	(349)
当代中国文化的“魂”、“体”、“用”关系	(365)
 全面评价冯友兰	 (383)
熊十力在中国传统哲学现代转换中的地位和作用	(395)
世纪之交儒学研究的若干观察与感受	(406)
王兴国《牟宗三哲学思想研究》序	(418)
甲申之年的文化反思	
——关于大陆新儒学问题的三封信	(423)
大陆新儒学的马克思主义分析	(446)
关于和谐文化研究的几点看法	(460)
关于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关系的三点看法	(470)
关于儒学的精华	(477)
“侯外庐学派”的最新代表作	
——读《中国儒学发展史》	(484)
 湘学研究的对象、范围和意义	 (493)
《现代性问题与湘学研究之“论”的维度》读后	(508)

千年湘学的历史意义和现代价值	(512)
王船山：从古代湘学过渡到近代湘学的关键人物	(527)
中医哲学研究的时代使命	(545)
中医哲学的“返本”与“开新” ——程雅君《中医哲学史》序	(552)
《中华医藏》编纂工作应适时提上日程	(563)
关于中医思维模式研究之我见	(566)

21 世纪与东西方文化

20 世纪只剩下最后几个年头，21 世纪即将来临。我们常听到这样的说法：“21 世纪是太平洋世纪”，“21 世纪是东方文化的世纪”。以大西洋为中心的世界舞台正在向着太平洋方向转移，世界文化中心也在由西方向东方转移。“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现在已经到了一个转折时期。

作为一个东方人，听到这种议论，自然感到十分欣慰，受到相当的鼓舞。长期在西方文化中心论压抑下的心灵，似乎得到了一种伸展与解放。但我们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真正发扬东方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的精神，我们应该是天下主义、普世主义、全球主义者。我们的先哲主张：“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孔夫子的哲学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不必一定是东风压倒西风，或者西风压倒东风。所以，我赞成这样的看法：21 世纪是东方文化复兴的世纪，同时认为，21 世纪是东西方文化进一步交流融合的世纪。

西方文明在过去几个世纪中，是一种强势文明，特别是在科技文明、工业文明、商业文明等方面，明显地优于、高于东方文明。我们所说的东方文明，主要是指亚洲地区的哲学和文化。它包括三大文化圈：东亚儒家文化圈（或称汉字文化圈）、南亚印度文化圈、中亚西亚伊斯兰文化圈。过去几百年这些地区基本上处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地位，它的文化不仅被西方人

轻蔑，而且连本土人士也没有信心，所以才有“全盘西化”、“脱亚入欧”等主张。今天发展中国的现代化运动，就其内容来说实际上主要也是西方化。在科技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西方文化大有席卷全球之势。

但是，西方文明并非尽善尽美。就是作为一种强势文明，它也不是一切方面都强。西方文明决不是永恒的绝对的文明，也不是人类社会最高级的文明。

20世纪以来，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西方文明的弊端日益暴露出来，不少西方学者把目光转向东方，希图从东方文化中寻求补救之道。更重要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殖民主义体系的瓦解，亚洲地区国家和人民相继获得了政治上的独立，有的实现了经济上的腾飞，同时也开始了文化上的反思和自觉。他们改变了过去那种对东方文化妄自菲薄、丧失自信的心理，并以新的视野和方法来重新审视、研究东方文化，充分肯定其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增强了文化认同感，也增强了民族自信心。在今天，伊斯兰文化影响着中东、南亚、东南亚广大地区，它在中国西北地区多民族中也有着深刻影响。汉字文化圈和印度文化圈主要是儒、释、道三个文化传统，也深刻地影响着东北亚、东南亚各国的历史和现实。今天人们都在思索和探讨：现代化虽然主要是西方化，东亚国家的现代化和西方现代化模式除了“同”之外，还有些什么“异”？儒、释、道思想在东亚国家现代化中到底起什么作用？现代科学的最新成果往往和古老的东方智慧有着某种契合，儒、释、道哲学中的一些基本理论和方法，到底对现代数学和物理学的新进展有何影响和启发？也就是说，在今天，人们已经不能不用现代意识来重新认识东方哲学和文化了。

当今的世界已进入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市场经济全球化、信息传播全球化、环境污染、核扩散威胁、恶性病传染、贩毒

和犯罪活动等也都变成了全球问题。世界已经缩小成为一个“地球村”。今日世界文化只能在全球意识下的多元化方向发展。虽然西方文化至今仍是一种强势文化，但是西方文化中心论或欧洲中心论已经是注定地破产了。

文化发展的最大推动力是经济。对 21 世纪的哲学和文化发展走向，我们必须在一个全球的经济—文化视野下来加以考察。从今天亚洲地区经济发展的势头来看，可以预见到下个世纪，亚太地区将成为带动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中心地带。随着经济的振兴，东方文化的复兴和繁荣也是必然之势。

东方文化的复兴不是传统儒、释、道文化和伊斯兰文化的简单恢复和延伸，而是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加速发掘各个文化传统中那些最本质的、也必然是与其他文化传统相通的即“人心之所同然”的共同的价值观，加速本民族文化和其他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使各民族文化的特殊性逐步融入全人类文化的普遍性之中。所以说，东方文化的复兴也是一个加速东西方文化交流融合，加速全球文化整合的过程。

和我们在展望 21 世纪时对东西方文化进一步交流融合的趋势采取乐观态度不同，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四年前在一篇文章中提出了世界文明冲突理论。他认为，在苏联东欧剧变之后，21 世纪的世界格局，已不再是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而是文化集团之间的冲突。他站在西方文化中心论的立场，为了维护美国和西方国家的经济利益，预先提出警告：在 21 世纪，西方将失去主控地位，基督教文化将受到儒家文化和伊斯兰文化的强劲挑战。未来世界将进入一个文化集团之间对抗和冲突的时代，具体说就是东亚儒家文化圈各国和伊斯兰世界结成联盟，共同与西方世界对抗的时代。

我不敢苟同亨廷顿教授的高论。我认为，除了利益蒙蔽了

他的眼睛，使他只看见文化冲突的浅近表面现象，而看不见文化融合的主流和长远历史趋势之外，西方人那种重分不重合、只见对立不见统一的思维方式，也是使他不能全面地认识未来世界文明进程的一个重要原因。

文明的整合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亨廷顿教授所讲的几大文化集团：基督教文化、儒家文化和伊斯兰文化，都是经过长期历史发展整合而成的几个大的文化群体。在同一群体中，也包含着许多文化派别，如基督教文化集团中，就至少有天主教、新教、东正教三大派，新教之中又有许多教派。在历史上，天主教和新教之间的冲突，其惨烈程度不下于基督教与回教之间的斗争。然而，不同文化集团之间是否就只有冲突斗争，而没有互相交流、影响、渗透以至同化、融合呢？美国是一个多民族、多文化的国家，它们可以由一部宪法结合起来，逐渐整合为有相当一致的经济利益、多样统一的文化群体。中国历史上也有过夷夏之争、晋楚之争、南北对峙等等，但文化的交流融合乃是大趋势，不仅中国境内多民族文化融合为华夏文明，而且从南亚传入的佛教文化也逐渐融入中国文化之中。十六世纪中西文化接触以来的历史也说明，除了文化冲突之外，中西文化之间同时也有一个接触、交流、调节、适应和融合的过程。要问现代中国文化的特征是什么，我认为传统与现代相结合、中西文化结合就是最主要的特征。从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到精神文化都是如此。我们今天讲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是中西文化融合的产物，或者说是中西文化融合的一种象征。如果不是看一时的文化现象，而是从长远的历史过程来看，就不会把文化冲突而是把文化融合看做是文明进程中的更本质的东西。

文化就是人化，是人的文明化。文明并不必然包含冲突，只有用野蛮的手段去强行推销某种文明时，才显出文明仿佛是

在冲突。不能用平等的态度对待其他民族的文化是引起文化冲突以至民族战争的根本原因。和西方哲学过分强调分别与对抗不同，东方哲学更重视和谐与统一。在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包括民族关系、不同文化的关系）时，东方哲人多主张和谐、和平，“协和万邦”，“厚德载物”。它所表现出来的人文精神，对西方高度发达的科技文明是一种必要的补充。我认为，未来的世界文化必将是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有机结合或统一，也就是东西方文化精神的结合、融合或整合。21 世纪将在东西方文化整合的过程中向前大大迈进一步。在整合过程中难免有龃龉和冲突，但只是一时的、局部的，从长远和全局来看，全球文化整合是必然的趋势和结果。我们大可不必对文明的冲突持悲观态度，而是乐观世界文化整合的大好前景，并努力为推进东西方文化交流融合尽我们的一份力量。

（本文是作者 1995 年 3 月 3 日在韩国启明大学国际大学院成立大会上的演讲。原载《中国文化研究》1997 年冬之卷。）

儒家文化与未来世界

——兼评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

四年前，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发表了著名的“文明冲突论”，引起了世界各国学者、特别是非西方国家学者的强烈反应。这几年陆续拜读了亨廷顿教授此后发表的其他一些文章和言论，在我脑子里产生了一个强烈的印象，即亨氏的“文明冲突论”不但学理根据十分薄弱，而且连他自己也未必真正相信。这一理论带有很大的虚伪性和欺骗性，它不过是为了掩盖美国和其他国家之间所可能发生的经济和军事利益冲突，竭力维护美国的霸权主义地位的一个幌子而已。例如，今年5月7日，他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新英格兰中国讨论会”上发言说：“中共与美国之间的基本冲突，不在于台湾、西藏或是人权问题，而是在霸权地位的矛盾。中共不愿看到美国在全球高居领导地位，美国也不喜欢中共在东亚的地区霸权。”很明显，在他看来，中美之间未来可能发生的冲突，并不在于儒家文化和基督教文化的矛盾，而是实际利益的矛盾，他认为主要是霸权地位的矛盾。美国一些人把中国的强大看做是对它的霸权地位的一种威胁，特别是对它在东亚地区的霸权地位的一种威胁。不管中国领导人怎样宣布“不称霸”，霸权主义者总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总是想“我喜欢霸权，你肯定也想谋取霸权”，而不相信深受儒家传统（它在两千年前就反对以力服人的“霸道”政治）影响的中国领导人“不称霸”的信

诺是真诚的。按照霸权主义者的“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逻辑，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国力加强本身就是大逆不道，就构成了对美国的霸权地位的威胁。于是他们制造“中国威胁论”，企图遏制中国的发展。“文明冲突论”也好，“中国威胁论”也好，都是美国一些人的霸权主义心态的露骨表现。其实他们心目中的“中国威胁”，决不是指儒家文化的威胁。儒家文化对美国的霸权地位并不构成威胁，对西方的基督教文化也不构成威胁。他们真正感到威胁的，是害怕中国经济发展和军事国防力量强大起来以后，会影响甚至危及美国在东亚地区和全世界的霸权地位，使美国不能为所欲为地掠夺这些国家的资源，剥削这些国家的人民，控制这些国家的经济、军事、政治和推行其“自由价值观”。在亨廷顿的心目中，美国的国家利益至上，未来世界的冲突仍然是实际利益的冲突，特别是经济和军事利益的冲突，“文明冲突论”只是一块遮羞布。前几年在美国国际政治学界开展的一场关于“为何要国际领先”的讨论中，亨廷顿是本民族利益至上主义的“鹰派”的代表，他强调美国今后必须在经济、军事上保持世界第一强国的地位，这样“全球稳定、繁荣和自由价值观才有保证”。亨廷顿在发表“文明冲突论”以后四年中所发表的大量言论，都在给他的文明冲突论作注解，明白无误地揭露了这一理论的虚伪性及其霸权主义的实质。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虽然是美国霸权主义的一块遮羞布，但是这一理论的发表却促进了各国学者对世界文明理论的研究。这也可以说是一个贡献。什么是文明？文化和文明是什么关系？世界几大文明是怎样形成和发展的？它们在历史上的相互关系是怎样的？不同文明之间是否必然发生冲突？文化冲突与文化融合是什么关系？从世界文明史来看，不同文明的冲突还是它们之间的互相交流融合是主要趋势？这些问题都值得

认真研究。另外还要研究：文化、文明和社会经济、政治发展是什么关系？到底文化、文明是社会矛盾冲突的根源，还是经济、军事、政治利益才是社会矛盾冲突的根源？或者说，是文化决定论还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历史唯物论更能说明问题的实质？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提出，也促进了对世界几大文明，特别是对儒家文明、伊斯兰文明和基督教文明的历史发展、本质特征及其未来前途命运的研究。我们这次会议的主题：“儒学与世界文明”，在一定意义上也可说是对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的一种回应。我们应该深入研究：儒家文明有些什么特征？它对世界其他文明一贯采取什么态度，处在一种怎样的相互关系中？儒家文明过去对世界文明发展作出过一些什么贡献？它将在未来世界文明中处于什么地位，起到一种什么样的作用？儒家文明会不会和伊斯兰文明结成联盟，对西方基督教文明构成威胁？儒家文明是一种好战、好斗的文明，还是一种爱好和平的文明？儒家文明可能给未来世界文明的主要贡献将是什么？这次会议发表的论文，将从各个不同角度对这些问题作出回答。我想参加这次会议的学者，多数都是不赞成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的，在这一点上会有高度的共识。但是，我们除了在政治上揭露它的霸权主义的实质之外，主要还是要从学理上揭露、说明文明冲突论为什么是错误的，我们的目标是要为人类文明的未来发展找到一条化解矛盾冲突、促进不同文明多元共存、互相交流融合的道路，而不是悲观地去论证文明冲突不可避免。我认为在这方面，儒家文化可以作出非常有价值的贡献，这是由于儒家文化本身的“贵和”的特点，它的道德主义、和平主义的性质所决定的。

亨廷顿认为未来世界文明的冲突将主要发生在西方文明和非西方文明之间，具体说就是将发生于西方基督教文明和东方的儒家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联合阵线之间。这里显然是以伊斯

兰文明为西亚文明的代表，而以儒家文明为东亚文明的代表。实际上，东亚文明除了儒家文化之外，还有佛教、道教、印度教、兴都教、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萨满教等，但儒家文化在东亚地区影响最大，把它作为东亚文明的代表也是有一定道理的。按照日本学者岛田虔次的观点，11 世纪以后，儒学不仅是中国文化的主流，而且成为东亚文明的体现。杜维明先生曾经多次重复这个观点。从现实情况来说，今天东亚国家和地区实现现代化的模式，和西方国家现代化的道路和模式有着明显的区别，有人把它概括为“儒家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和模式。所以，不论从历史上来说，还是从现实情况来看，把儒家文化作为东亚文明的代表，把东亚国家和地区称为“儒家文化圈”，都是有一定的根据和道理的。它不仅具有象征意义，而且具有实质内容的意义。

我个人认为，亨廷顿教授在考察世界文明发展的历史及其未来前景时，过分夸大了东西文明的差异和矛盾冲突的一面，而忽略了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动、互相学习借鉴、互相渗透融合、促进人类文明共同发展进步的这一面。也就是说，他把文明的冲突看成是绝对的，而把不同文明的和谐共处、交流融合看成是相对的。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其实从世界历史的长远发展过程来看，文化冲突只是浅近的表面现象，文化冲突的背后都有实际利益的冲突在起作用，文化交流融合、整合才是主流和必然的历史发展趋势。东西方文明之间从来都是互相学习借鉴、从不同文明中吸取营养来丰富发展自己的，许多西方学者也看到了这一点。例如英国哲学家罗素说：“不同文化的交流过去已经多次证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希腊学习埃及，罗马借鉴希腊，阿拉伯参照罗马帝国，中世纪的欧洲人又模仿阿拉伯，而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则仿效拜占庭帝国。”欧洲文化学习借鉴各种民族文化，不但没有丧失自己的文化传统，

而且大大丰富了自己的文化内涵。中国文化也是这样。不仅华夏文明是由中国境内多民族文化长期交流融合而形成的，而且从南亚传入的佛教文化也逐渐融入中国文化传统之中；16世纪以来又有中西文化的交流融合，这个过程规模越来越大，内容越来越深刻，以至我们今天的衣食住行，从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到精神文化，可以说无不是中西文化交流融合的结果，许多都表现为中西合璧的复合型文化。我们如果不是看一时的表面的现象，而是从长远的历史过程来看，就不会把文化冲突而是把文化的交流融合看作是文明进程中更本质的东西。亨廷顿看不到这一点，除了利益蒙蔽了他的眼睛之外，我想西方人那种重分不重合、只见对立不见统一的思维方式，可能也是使他得出文明冲突论的重要原因。

在怎样看待不同事物之间的矛盾冲突与和谐统一的问题上，东西方人的思维方式确实有很大的差别。注重分别和对抗是西方人的思维传统。西方辩证法的奠基人赫拉克利特曾经说过：“战争是万物之父，也是万物之王。它使一些人成为神，使一些人成为人；使一些人成为奴隶，使一些人成为自由人。”又说：“战争是普遍的，正义就是战争，一切都是通过斗争和必然性而产生的。”西方文明崇尚浮士德精神，就是一种不断向外索取的斗争精神。在近代西方文化中长期占统治地位的思维方式是在绝对不相容的对立中思维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亨廷顿教授把文明的冲突绝对化，正是这种西方传统思维方式的典型表现。它同中国重和谐统一、动态平衡的思维方式，同“和为贵”、“和而不同”的中国哲学传统可以说是大相径庭。

中国哲学承认事物的差别、矛盾、对立的普遍存在，但是更重视它们之间的和谐、平衡、统一，认为“和”是世界的普遍原则。儒家经典《论语》中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重礼贵和正是文明的特征，也是孔子和儒家的价值追

求，是他们推重的“先王之道”的主要内容。《中庸》进一步强调：“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即认为“和”是宇宙普遍通行的准则，世界的普遍规律。什么是“和”？早在公元前800年的西周时期，郑国的史伯就指出：“以他平他谓之和。”不同的事物和矛盾方面取得一种平衡就是“和”，也就是事物的多样性的统一。史伯提出了“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重要哲学命题。他已经认识到，只有把不同的事物配合、联结在一起，才能达到“和”即平衡统一；“和”才能产生新事物。如果只是把相同的事物加在一起，“以同裨同”，那就只有量的增加而不会发生质的变化，就不可能产生新事物，事物的发展也就停止了（“尽乃弃矣”）。春秋末年齐国的晏婴继承和发挥了史伯关于“和”与“同”异的思想，他以厨师做菜和乐师奏乐等日常生活事例以及政治生活中的君臣上下关系为例，进一步阐明了对立事物相成相济的辩证法道理，说明“合羹之美，在于合异；上下之益，在能相济”。后来孔子也继承了这种贵和去同思想，明确提出了“君子和而不同”的原则，批评“小人同而不和”即追求绝对同一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以后“和而不同”一直是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体现了中国古代辩证法的精华。这就是对立统一的思想。后来《周易》中提出了“太和”的概念，宋代哲学家张载解释说：“太和所谓道，中涵浮沉、升降、动静相感之性，是生氤氲相荡、胜负、屈伸之始。”所谓“太和”是包含着对立事物和力量之间的复杂矛盾运动的，但是矛盾的对立斗争最后都要归于和解统一，所以张载说：“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中国古代辩证法对对立统一规律的认识有过分夸大矛盾的和解、统一的缺陷，但是对西方辩证法过分夸大对立、斗争也是一种纠正。这两个方面也要辩证地统一起来才好，避免两个方面的片面性。我们说中国古代辩证法有“贵和”的特点，这是一个基本事实。“和”是“天下